

闽都文化

多／学／科／视／野／中／的

陈永正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多／学／科／视／野／中／的
闽都文化

陈永正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 / 陈永正主编.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211-06015-3

I. 多... II. 陈... III. 文化史—研究—福州市 IV. K295.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7652 号

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

DUOXUEKE SHIYE ZHONG DE MINDU WENHUA

主 编: 陈永正

责任编辑: 黄杰阳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30 毫米×990 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211-06015-3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近一个时期，研究、宣传地域文化渐成热潮。诸如陕甘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江淮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常见书刊报端。如果说，正是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构成星河灿烂的中华文化，那么，闽都文化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闽都文化，滥觞于古代闽江下游出海口，覆盖闽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乃至闽东一些市县，影响及于全省各地。她是在昙石山文化为根基的土著闽族文化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如越文化、楚文化、上周青铜文化、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文化、西方近代文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每一次与外来文化的接触、融合，都使得闽都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积淀更加深厚。闽都文化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有过许多阶段和不同形态，闽越文化、理学文化和船政文化是其中最为辉煌的篇章。福州市郊闽侯县的昙石山文化遗址，反映了距今五千到三千年闽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特征。遗址表明，闽族先民从氏族社会迈进了阶级社会门槛。大量出土的印纹硬陶器具反映闽族文化已经成型，并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有过交流。战国晚期，越国为楚所灭，越族部分后裔入闽，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物质文化。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 202 年封无诸为闽越王，都冶为城（冶城即以后的福州），建立闽越国。闽、越两族原本就习俗相近，在结合和交融中形成了闽越文化。喜食海产、水行山处、断发文身、蛇为图腾、多种信仰等闽越文化一些特征，成为闽都文化的因子，长期保留下来。从晋末“永嘉之乱”到宋代，中原汉族士庶为躲避战乱，多次大举南迁，衣冠入闽，带来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在中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唐朝以后，福州作为八闽行政中心，经济文化逐渐加快发展，倡学兴教渐成风气。王审知治闽，重农商，也重文教，福州文风由此益盛。宋代以后，福州书院林立，学子广布，文风鼎盛，登科名世者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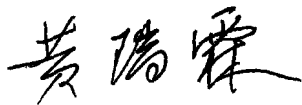
多。宋代福州有进士 2247 名，超过各州军。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开创闽学，广收弟子，理学文化在福州蔚然成风，“城里人家半读书”、“路逢十客九青衿”是当时生动写照。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思想文化，深刻影响其后六、七百年。鸦片战争之后，福州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清朝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楨等人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宗旨，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设立船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引进西方办学模式，传授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专业人才。同时，还派留学生到西欧学习。船政学堂创办 46 年间，培养出 600 多名学生，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这批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严复、陈季同、魏瀚、陈兆鏞、罗封禄、王寿昌、巴玉藻、王助、邓世昌、詹天佑、萨镇冰等等，这批船政学人成为时代骄子，他们的名字至今仍让人肃然起敬。他们赤诚爱国，有的大量翻译西方名著，以新知开启国人觉悟，呼吁救亡图存。严复因此被毛泽东称为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的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造舰船、造飞机，开矿山、修铁路、办电报，推动我国近现代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进步。他们奠定中国近代海军的基础。以福建船政为基础而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船政文化，是中国与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的崭新文化形态，是闽都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也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

闽都文化，也称福州文化。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八闽首邑，素称“海滨邹鲁”。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福州自汉代初即为闽越国都，此后 2200 多年中，虽然建制沿革、辖区屡有变更，但作为八闽首邑始终处于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崇文重教、修身齐家、为国家读书、为民族献身成为这个城市的最显著的特征。生于斯、长于斯的闽都文化自然成为闽文化的典型代表。闽都文化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的、全方位的改造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闽都文化植根于海边江畔，福州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自古和台湾等外岛联系密切，闽都文化又具有海洋文化的某些特点。值得庆幸的是，闽都文化的历史载体，有许多至今仍保存于我们身边。昙石山文化遗址、三坊七巷、船政学堂是其中的瑰宝。我们漫步在这些遗址院落、坊巷宅第、工场学堂，仿佛穿越时空隧道，重见往日辉煌。闽都文

化的历史信息和蕴积层面通过这些实物景观，不但可以心领神会，而且可以眼观手触，无疑更增添了她的光彩和魅力。

近年来，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组织力量，研究宣传闽都文化。这有助于海内外各界人士更好地了解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利于推进文化强市战略，增强城市竞争力。福州把“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城市精神，形象地概括了福州人开放博大、兼容并蓄的精神境界和开风气之先、谋天下永福的思想品格，必将进一步激励闽都儿女虚心学习，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把福州建设得更加美好！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闽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在闽江学院应运而生；即将集结出版的《多学科视野中的闽都文化》，正是“中心”最近召开的闽都文化专题研讨会的丰硕成果。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研讨闽都文化，既有具体细微的研究，又有高屋建瓴的宏论；既有历史轨迹的钩沉，又有对现实问题的探究；既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又彰显了闽都文化的独特性。有高度，更有深度，可喜可贺。但不可就此止步，研究应当深入，内涵还须挖掘，意蕴有待阐发。希望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继续努力，深入探讨，以期取得更大成果，为推进福州乃至全省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撰序者系福建省委原副书记）



2009年4月26日

目 录

林金水：晚近来闽传教士笔下的福州民间文化	(1)
徐晓望：闽都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21)
张兰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对闽都文化的影响	(29)
林 星：中西文化视野下的福州城市教育的现代化	(37)
刘丽君：晚清闽抚徐继畲名作《瀛寰志略》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52)
雷阿勇：西学东渐与晚清福建教会外文教育研究 ——以福州地区为中心	(63)
杨齐福：教会学校与福州教育近代化	(84)
翁伟志：在世俗与宗教之间 ——论福州三一中学的学生培养	(97)
汪敬钦：“福州乌石山教案”一百三十周年祭 ——兼议晚清“抚闽”办案数疆吏	(109)
陈大莲：清季福州民教纠纷研究	(134)
吴巍巍：医疗·福音·文化 ——基督教传教医生与近代福州社会探论	(143)
尹 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 ——乌石山教案剖析	(156)
郭秀清：近代中西关系的碰撞与交融 ——以闽都船政文化为例	(175)
王日根：福州海洋文化与闽南海洋文化比较片论	(188)
陈永正：从福州的对外传统看闽都文化的海洋性特质	(196)
薛 菁：闽都文化若干问题探研	(205)
胡沧泽：明代福州府志的特色	(222)
戴显群：仓山近代建筑今昔谈	(228)

邹自振：闽剧源流及其发展	(233)
李 颖：福州美华书局述论	(245)
陈 东：闽都文化与近代福州钱庄发展关系探析	(258)
黄清敏：文契中的清代福州山区商品经济	(265)
林秀玉：从明清时期福州城隍信仰的特点看闽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276)
林观潮：明清福州府籍渡日唐人僧人概况的研究报告	(287)
王晓云：穆斯林东来与福州伊斯兰历史文化	(305)
毛晓阳：清代福州进士时空分布与福州全省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	(315)
陈日升：闽都移民文化初探	
——以侨乡福州亭江镇的海外移民为例	(327)
蔡清德：明代福州书家考略	(334)
张 帆：青年从政时期陈宝琛的洋务观	(358)
张胜璋：林纾：近代福建的“文化之子”	(369)
郑新胜：郁达夫笔下的福州风情	(381)
唐 希：约翰·汤姆森与闽都摄影	(400)

后 记

晚近来闽传教士笔下的福州民间文化

林金水

摘 要：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潮流中，西方来闽传教士对福州民间文化的记述和报道是一块重要的内容与组成部分。对于此，目前学界尚不见有专门的探讨。本文在爬梳钩沉大量西文文献和文本之基础上，选取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口承文化与街头制艺娱乐等方面，论探西方人士对福州民间文化的考察与研究，由此审视福州民间文化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视阈中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态。

关键词：福州 民间文化 近代 西方传教士 文化交流

引 言

民间文化是指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从社会分层上看，民间文化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由平民自发创造的文化。民间文化还是一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源远流长，其内涵范畴包容广阔，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间文化分类》一文中，对中国民间文化所包括对象作了归纳分类，纳入考察范围有生产贸易、衣食住行、社会家庭、人生仪礼、生态科技、信仰、岁时节令、语言文学、民间游乐和艺术十大类和下辖数十类的有关对象^①，由此可见民间文化内容之丰富。地域性与传承性是民间文化的两大基本特征，以此为观照：福州民间文化可谓是颇具典型代表性的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区域个案之一，其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表现形态和人文景观，并在时光的年轮步入晚清之世后表现尤甚。而更令人瞩目和深具时代意义的是，福州民间文化还与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紧密地联系

^① 乌丙安等：《中国民间文化分类》，载《中国民族》，2003（5）。

在一起。

19世纪中叶，西方人在武力之强势和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接踵来华。福州作为第一批开放通商的沿海口岸城市之一，较早地成为外国人侨居与开展活动的场域。近代主要有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三大群体活跃于福州土地上，其中，传教士因背负着宗教与文化传播的使命，与福州民间文化有着最为“亲密”而持久的接触和联系，并在此一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考察与报道，留下许多文字撰述记录（当然，不止是传教士群体，其他来闽西方人群如外交官、旅行者或侨民等，都或多或少留存有记述福州的作品，这在文中将会涉及）。西方传教士对福州民间文化的记载与介绍，带有西方人猎奇的眼光，更表现出东西文明与文化在特定的时代情境和特定环境下所碰撞出的阵阵火花，同时对今人探寻历史的相貌，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素材。鉴于前述民间文化内涵之“包容万象”，本文不可能对之一一进行考述，且对西文作品亦非兼收并蓄。下文将从民俗文化、宗教信仰、口承文化与街头制艺娱乐等几个比较突出的方面，对福州民间文化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表现及其内涵，作一初步的勾勒与论探。

民俗文化从广义上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代名词，本文所述民俗文化主要指流行于福州民间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基本的惯常性习俗礼仪，而非广义之概念。具体来说，即节庆习俗、婚丧习俗及其他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生态。

节庆习俗。对福州社会传统节庆习俗活动记述最详细和最有代表性者，当推被誉为社会人类学汉学家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他在著作中对福州地区流行的中国人传统农历节日和节日期间的欢乐庆祝活动，以及相关的礼仪习俗等，作了深入的考察和记录，颇具人类学田野调查意义。卢公明对榕地农历节庆的记述非常全面细致而不失准确。例如，中国人最重要之节庆——春节，是传教士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卢氏对福州人过春节期间的欢庆场面，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

“新年的庆祝活动从正月初一的一大早就已开始，与这些节庆相关的准备先前（指上一年腊月）业已完成。据观察，新春的欢庆活动一般在

每个大家庭举行，老百姓一般将这一系列节日分成五部分：1. 准备祭拜‘天地’的祭品；2. 礼拜供奉于家中诸神；3. 祭祀祖先；4. 拜谒尚健的祖父母、父母等；5. 拜年。（其后是有关这五项敬拜活动的细节描写，此不一一摘引）……通常，在新年春节的头几天，所有的行、店、杂货铺都闭门休业。许多大型的行店休业五至六天，有些甚至直到过了第十五天才开业。……当地中国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在新年头三天，除了买糖、甜食、花生及一些茶点外，花钱或是做买卖都是不吉利的。大年初一全国欢腾，除开必须做的活儿之外，人们都休息享受，非得有人干活时，顾主得花上双倍或三倍于常时的价钱请一个劳力（或称苦力），街上赌铺生意红火，亦有人在家中赌钱。中国法典严禁赌博，然而在过年的时候，官方对人们参与赌博都睁一眼闭一眼。在中国，大人们几乎都晓得若干赌博方法。习惯上，人们要给那些在大年初一上门拜年的邻居小孩福橘……估计有百分之九十的家庭在大年初一这天不吃肉，以示其对天与地的敬意。这一传统也称作‘吃斋’，并以之为美德……达官贵人们整个一月都用来休息、狂欢、宴客、互访、看戏，除非涉及职责的紧要件，他们都放下公务不理。士绅之间互相宴请，戏班子此时亦相当繁忙，在官方场所或邻近庙宇上演戏剧。新年头半月的各种节日活动经常包含有晚间的烟花炮竹，纷呈多彩。要燃放鞭炮的场合很多，例如祭拜天地、礼拜神佛、家逢喜事、立誓许愿，大家庭于宗庙或自家里祭祀祖先，或是大官家的下属请来戏班子谢神时，或是有钱人家有贵客临门时都要大放鞭炮……”^①

通过以上描写不难看出卢公明对中国农历节庆重头戏春节及正月期间有关欢庆活动等有着十分深刻和深入的考察和体认，甚至关注到人们在新春期间做买卖的惯俗、赌博的泛滥、好彩头的给讨、吃斋的习惯及祭拜演戏活动等，这些习俗有的直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体现了民间传统文化延续贯穿的传承性和稳定性；有的习俗随着社会环境变迁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及习惯改变而消失。当然，由于各地习俗的差异和自身视野的局限，年

^①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with special but not exclusive reference to Fuhchau*,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65, Vol II, p23~29.

节期间一些重要的活动内容在其笔下也付之阙如，如大年初二出嫁女儿回娘家、春节期间的禁忌等，不过这并不影响其记述的价值。

众所周知，农历新年是一个有系统、有传统积淀的民众休闲娱乐、狂欢庆祝的“假期”，其活动周期不仅包括正月初一到十五的休闲欢庆期段，还要回溯头一年十二月即腊月尾日的准备期段，尤其是大年三十除夕节日的欢庆活动。民俗学者认为，年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年节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辞旧迎新”^①。同样地，卢氏对新年的主题也比较成系统化地介绍，他还详记了元宵闹花灯猜灯谜，春节前的“小年”节俗、祭灶习俗等，体现出传统节日活动的形式之系统而丰富。

除了详细描绘除夕、春节等最为重要的节日外，卢公明还按农历月份逐一对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庆进行记述。举一例来说，卢氏对重阳节福州人“登高放风筝”的记载，即颇具参考价值：“福州这里每到九月初九这天就有登高放风筝的习俗……每一年市政长官（福州知府）都会就放风筝一事发布公告，警示人们在九月初九那天不得在乌山过分喧哗。通常每年派有县官带一大批人或治安人员到乌山维持秩序。因为九月九那天若天气晴好，大约有四五万人到乌山游玩放风筝”^②。据方炳桂先生介绍，福州人放风筝，过去是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前后，老人带小孩登山放风筝，意在祝愿“步步登高”。放风筝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台大庙山、市内乌山、于山和南教场（今五一广场）。借助传教士的记录，对于今日探究先人当时活动情形及传说来由等颇有裨益，亦可佐证学者们的研究或提供参考注脚。

婚姻礼俗。美部会女传教士唐尔雅（Miss Ella J. Newton）曾对福州地区订婚和结婚习俗作了专门考察并撰述颇具代表性的一篇文章，在文中，唐氏对福州婚俗一开始就给予批判，直陈婚姻礼俗中的种种不良现象：“首先，对于那些即将结合为夫妻生活的双方没有互相认识的机会和权利。婚姻大事由年轻人的父母或亲属决定和安排，通过请一位赚取服务

①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14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②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I, p71.

费的媒人说媒，而媒人常常把对方的家境和条件进行恶劣的欺骗；第二个错误是请算命测字先生决定男女是否适合的问题，不是根据任何男女双方个人情况，但却是通过比较双方门户和地位及对照双方生辰八字和星相来决定；再者，当地风俗是需花费一笔庞大的订婚礼金，往往超出男方家庭的承受能力，可能导致他们此后负债多年；另外，订婚仪式常常在童年时就已安排……女方如同牛、猪一样是丈夫家庭的财产，在家庭事务中被认为没有个人意志；关于举行婚礼的仪式，观察者目击到的是从开始到结束的场面都充满着迷信和崇拜行为。日子要选在算命先生测定的黄道吉日，女方家庭成员不能随女方来男方家……新娘和新郎在婚礼会客过程中被要求祭拜天地、厨神和祖先牌位，敬拜健在的长辈，贯穿于各种细小礼俗仪式的迷信活动被视为很重要，十分繁琐而愚蠢地反复进行”^①。唐氏这里还只是作大体上的介绍，较为概括，但却一开始就鲜明直接地为婚姻礼俗定下基调，认为福州婚俗充斥不合理现象，甚至充满迷信与偶像崇拜、是令人震惊的“异教教义的新发现”，透射作者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评价观念，认为这些不好的习俗是基督教文明评判标准和改造对象。唐氏所述在传教士群体中具有很大代表性，虽在细节上不甚着墨，却体现了当时传教士对福州地方婚俗一种普遍的定调和体认。

颇具社会学家特质的卢公明对福州婚俗的记述更是细致入微，例如在其编撰的辞典《英华萃林韵府》中收录了75条有关婚俗的用语，其中具有福州本地特色的习俗亦有不少，如“年庚八字”（问字）、“定聘”、“合婚”、“起贴”、“纳采”、“送上头”、“安床”、“迎饮”、“试状”、“迎轿”、“接亲”、“请下轿”、“脱妆”、“出房”（出厅）、“请回门”^②等等。笔者查阅有关材料，卢公明所记基本符合福州婚俗的整个过程与大致状况。而更为出彩的是卢氏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对福州婚姻习俗的细节描写，是书专辟三章详述关于婚礼整个过程（包括订婚、结婚和婚后生活及生

① Miss Ella J. Newton, "The Betrothal and Marriage Customs of China (Foo-chow)", *The Chinese Recorder*, (August, 1892), p376~377.

②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英华萃林韵府),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vol2, p579~580; 参照周立方:《福州婚嫁习俗》，64~68页，载福建省民俗学会编《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育)的各种习俗仪规,反映了时人婚礼过程中繁琐的仪式和婚前、婚后复杂的习俗^①。

丧葬习俗。西方人士发现,中国人对丧葬极为重视,他们在福州郊区乡村的旅行和实地考察途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坟墓到处都是,看来像是布满整个乡村。你可以看到远处山上首先映入眼帘的许多碑刻,看上去周围树木都被砍倒,仅留下树桩;当你走近一看你会发现你所认为的树桩其实都是墓碑。无论我们到哪,经过它们发现许多墓碑靠近房屋”;他们也时有观察到葬礼出殡场面的仪式过程,“当送葬出殡的队列排好组成时,一名男子手执一幅挂上白布的长旗,名曰‘灵幡’,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紧随着两位男子扛着幡旗,旗上标记的字句意味着一种希望死者能够享有带给他的祝福的愿望。紧接着一名男子举着一只被认为是灵魂附体的白公鸡,该男子身后紧随着两顶轿子,第一顶运放着死者的祖先牌位和灵台,第二顶放着其肖像。抬着轿子轴杆的两位主要亲属哀嚎悲窈,拖着它们缓慢前行。在队伍前进过程中,路的两边撒满了散落的纸钱,为了安抚满足那些可能出没在路上的贫穷饥饿的鬼魂。伴随棺材埋葬进墓穴,要放一碗米饭在里面,还要撒上稻谷和茶叶。挖坟土者在地面铲土时,僧侣捧着白公鸡,站立在坟墓下方,让这只神鸟向着棺材鞠躬三次。这一奇特的习俗仪式由死者主要的亲属们重复地进行,这时灵幡也被烧成灰烬”^②。

上述有关福州地区特色丧俗——在棺材上放白公鸡的行为,在卢公明的著作中亦见载:“福州有个独特的、关于将那些死在异地的人的尸体运回家的风俗。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时,家中的一些成员就带着活的白公鸡或白公鸡的模拟像(用竹片和纸做成与真的公鸡一般大小,再着上颜色使它看起来比较自然)前往迎接棺材。他们把公鸡的脚绑在一起,让它站在棺材上面,队伍就在哀悼者的哭声中往家的方向行进,公鸡始终都站在原处……据中国人说,在迎接遗体时,死者的三个灵魂之一会附在公鸡身上,然后由它引回家……人们从来不把作为亡灵暂时停留之处或护送亡灵回家的白公鸡杀掉吃,而是加以悉心饲养照顾,直到自然死亡。有人解释

① 见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chapter 2、3、4。

② Irene H. Barnes, *Behind the Great Wall: the story of the C. E. Z. M. S. work and workers in Chin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1896, p16~18。

说,这种场合中使用纯白的而不是其他颜色的公鸡是因为白色是哀悼的标志;有人说白公鸡是‘神鸡’,中国人无法解释这一风俗的由来,也无法通过任何辩论形式证明它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合理性……除了将这些解释为‘祖先们继承了以前的风俗习惯,并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之外,再没有其他更合理、更令人满意的答复了。他们好像并不在乎去研究迷信的根源,在看不出预期目的与习惯采用的追求方式有任何联系时,也不会摒弃这些传统的仪式与礼俗”^①。

卢公明对福州民间的丧葬习俗之渲染与记述相当细致具体。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专辟两章介绍福州人死亡、哀悼与埋葬等一系列有关丧葬礼俗的全程表现形态。在其笔下,中国人的丧葬习俗充斥着异教迷信色彩和灵魂观念,是佛教、道教仪式汇集的舞台。例如为死者做法事仪式,他注意到“所有这些场合都由几个请来的道士主持,常备有肉、菜、酒;有时还有一瓶鲜花、香、蜡烛与纸钱。总的说来,这些仪式由吟诵经文组成,以减少死者在阴间可能遭受的灾难或困难……道士们吟诵叨念与主题有关的经文或仪式文……还有一个仪式,由请来的佛教和尚异口同声地反复诵读包括一千个佛的名字在内的《千佛宝忏》,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让念到名字的佛能大发慈悲、运用法力超度亡灵”;面对着这种在卢氏看来是“异教”色彩与迷信行为云集的场面,他显得颇为感慨,认为中国人“除了自己所拥有的之外,他们不再需要其他任何宗教”^②。

其他民间日常习俗。敬惜字纸是古代中国一种良好的风俗,是对文字和文化尊崇的表现。从传教士的记述中可以得知晚清福州城乡社会敬惜字纸风气的兴盛,圣公会主教四美(George Smith,也被译为施美夫)在福州游历期间曾见,“节庆的季节(农历十二月)……日落不久,整条街上的居民都会从家里出来,手中捧着一小堆写着中文字句的纸条,在门前恭恭敬敬地焚烧,以免亵渎他们的文字。冒着烟的余烬一堆连着一堆,显示了这个习俗的普遍性”^③,又如卢公明所记:“福州城和郊区的墙上、房子的四处都贴有大量的五六英寸长的小纸条,纸条上写有四个字号召人们

①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p214~216.

②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p197.

③ [英]施美夫(即四美)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28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敬惜字纸’。在路边的房屋或商店都悬挂有可装约一配克东西的小篮子，篮子外贴着这种小纸条，以便让附近的人将印有字的废纸扔进去。在繁华的街道或隐僻的小巷，都设有能装半蒲式耳到几桶的形似房屋或宝塔的火炉，其上也象那些篮子一样刻有字，火炉用于将投入的废纸烧成灰。小一些的火炉通常是与房屋建在一起，大些的火炉就用砖头砌在地上，常常被涂上华丽的颜色”^①。

“拗九节”吃“拗九粥”是福州地区特有的民俗活动^②，传教士对此有记：“当地正月廿九早晨有个节俗：即吃‘孝敬长辈粥’（即拗九粥，译注）。当天早上不煮单单的白米粥，人们把一种很粘的米（糯米，译注）加入白稻米里，同时也放些吃的东西，如糖、干枣、花生、芋头、芝麻等，煮得粘稠。俟成，整锅粥杂杂脏脏的，不如日常的白米粥那般白净……当地习俗要求已婚女性，无论结婚多久，只要父母尚健在，住处又不远，都必须在正月廿九那天，带上一两碗自己做的‘孝敬粥’去往父母住处，以示孝顺。通常会顺带捎上家禽和其他食物。作为回礼，父母也把自己做的粥让女儿带回去。成家后的男子，若祖宅不远，也会给父母送上‘孝敬粥’以示孝顺”^③，从卢氏的记载中，我们可深刻感受到福州特色节日悠久的历史与良好的传承及其美善的意义，并借此比照同样之习俗在今日的不同历史境遇。

闽人“尚巫好鬼”，传统的治病医疗也充满鬼神观念和求神信巫等陋象。卢公明发现，中国人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充斥着迷信神灵的现象。他记到：“当中国人生病时，常常求助于某位男神或女神，并认为他们所得的某种疾病是受这些神灵操纵。他们在神像前烧香，祈求尽快康复。如果得以康复，他们就把功劳归于所拜的那位神，并按照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求助男神或女神时所许下的愿的性质，奉献上不同丰盛程度的肉和菜与数目大小不等的开销……”^④，等等；此外，传教士还对福州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普度习

①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I, p167~169.

② 有关福州拗九节及拗九粥之民俗的起源和发展变化，可参见王天杞、王晓：《福州富有特色的岁时节俗》，80~81页，载福建省民俗学会编：《闽台岁时节日风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③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I, p41~44.

④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p142.

俗、冬至搓丸（圆）、农业节令习俗等，作了较为细致的渲染和介绍。

二

福州民间宗教文化与各种信仰崇拜现象是西方传教士最迫切关注的对象之一，在西方人视野里，福州民间浓厚的宗教信仰文化氛围，不啻为宣播基督教的最大障碍，于是他们给予的关切也相对较集中。

佛教与道教。在来榕传教士论著中，大多都含有记述福州佛教情况的有关篇幅和片段碎语。例如英国传教士哈迪（E. J. Hardy）在福州访问游历期间，记录了所见佛教寺庙情况，并拍摄了乌塔与白塔寺庙相对遥望的景致^①，反映出西方人视野下福州城市中佛教兴隆的真实图景。卢公明笔下也展示了福州城佛教兴旺发达的景象，“在福州，佛教要比道教更盛行，城市及郊区有数百名佛教和尚。他们居住在为推崇、敬拜佛祖而建的某种寺庙里，英语称之为‘monasteries’（修院），以与其他庙宇相区别。这些建筑常设计成大量和尚居住的场所，有厨房、餐厅、睡房与藏书楼。当地总共有 30 座这样的寺院，包括那些位于城市东面与西面几英里处的地方。有几处寺院还保存得很好，有些是由居住在里面的和尚负责管理”^②。对福州佛教的记述介绍最集中于涌泉寺这一案例。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涌泉寺作过参观或考察的传教士前后计有十数名并留下游记文字，叙述所见所感。如四美有记：“在福州城东南 25 里路的鼓山的半山腰，也有座著名的佛教寺庙，名为涌泉寺。寺内有 100 个僧人，靠捐赠维持，其中有 60 人常住寺内”^③。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陆一约（Edwin J. Dukes）通过对涌泉寺的考察，注意到和尚的出身：“和尚们部分是通过买来男童并按佛教有关规定将他们培训成和尚来维持教派，他们当中很大部分是还在小孩时代就被其父母供送来过寺庙生活，或是在孩童时就被善会作为商品买卖的对象，以充足寺院人员数量”^④等等。

① Rev. E. J. Hardy, *John Chinaman at Home, Sketch of Men, Manners and Things in China*, London: T. Fisher Unwin Paternoster Square. Mcmiv1905, p66~69.

②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I, p236.

③ 《五口通商城市游记》，293 页。

④ Edwin Joshua Dukes, *Everyday Life in China or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5, p215.